敦 製造質 胜 膏館 总 藏 燼

敦上

上 海 海 古 籍 置 出 書 版 社 館

編

獻藏

001 - 048

海 古 籍 一九九九年・上海 出版社

上

4)煌吐魯番文獻一海 圖 書館 藏

編 編 輯 者 李府陳 上上 海古 震憲秉 宇展仁 籍圖 出 版 社館

郭王 子翠 建蘭 劉夏 景 雲穎

編 輯 府 憲 展

執

行

責

任

編

輯

郭

子

建

敦上 煌吐魯番文獻海 圖 書 館 藏 1

編 者 海

上上 海 古 籍圖 版 社 館

裝

幀

設

計

嚴

克

勤

攝

影

方

偉

版 上海瑞金二路二七二號 郵政編碼 二〇〇〇二〇上 海 古籍出版社

出

製 上 海 古 籍 印 刷 廠

印

(C) 上上

海

出

版

社 館

| 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 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 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版 | 一九九九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 三六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 158

Dunhuang-Turfan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Shanghai Library



001 - 048

Shanghai Library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1999 顧 總 敦

策

潘季魏重羨同規林賢

饒宗頤

煌吐魯番文獻集成

\$

The Corpus of Dunhuang-Turfan Manuscripts

PLANNER-IN-CHIEF

Wei Tongxian

CONSULTANTS

Ji Xianlin

Pan Chonggui

Rao Zongyi

Dunhuang-Turfan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Shanghai Library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S

Shanghai Library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EDITORS

Chen Bingren Wang

Wang Cuilan Xia Ying

Fu Xianzhan

Guo Zijian

Liu Jingyun

Li Zhenyu

EXECUTIVE EDITOR

Fu Xianzhan

EDITOR-IN-CHARGE

Guo Zijian

PHOTOGRAPHER

Fang Wei

COVER DESIGN

Yan Keqin

Dunhuang-Turfan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Shanghai Library Volume 1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S

Shanghai Library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R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72 Ruijin Second Road, Shanghai 200020, China)

PRINTER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rinting Factory

©Shanghai Library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Octavo 787×1092 mm 47.25 Printed sheets 36 Insets First edition June 1999 First printing June 1999 ISBN 7-5325-2594-5 Z • 339

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策畫弁言

魏同賢

動了 相若 成, 這就 樓蘭等地區 術環節。 寫和刻印的文書以及多姿多采的繪畫、 經室中所發現的産生於四世紀中葉至十一世紀初的大量用漢文和梵文、藏文、粟特文、回紇文 數萬件手寫卷軸和刻印典籍以及繪畫、 商朝的歷 的 被稱爲中國文化史上四大發現中的兩大發現,這就是一八九九年殷墟甲骨文的發現和 魯番學的深入發展形成了困難 的政治、 發現。 一門 當歷史的車輪由上個世紀向本世紀馳進的時刻,在積貧積弱、列強凌欺的中國大地上,卻接 這批被學術界稱之爲吐魯番文書或西域文獻的資料同敦煌文獻相聯繫、印證、 經濟 同樣令人鼓舞的是, 爲深入的研究創造了條件;而敦煌吐魯番文獻的公布、 國 史研究提供了可信的資料。後者在甘肅敦煌縣鳴沙山莫高窟第一七號洞窟的 前者在河南安陽小屯村先後發掘的十多萬片甲骨,已將我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提前了數 際性學科 ,也發現了大量的古代遺書,其出土地域同敦煌接近,而文書年代、內容和形態亦與 、法律、宗教、語言、文學、科技、藝術和風俗等各學科的研究,填補了一些迷失 ,它所提供的真實獨特的資料,已經有力地啟動並迅速地推進了對我國和中亞地區 敦煌吐魯番學的誕生與發展。 於敦煌藏經室打開的前後, 雕塑等等,它的學術價值雖然尚未被全部認識 雕塑,廣泛地涉及我國西部和中亞地區各民族古代社 所不同的是 在新疆吐魯番及塔里木盆地庫車、 輯集、 殷墟甲骨的 印製卻遠未實現,這自然 輯 集 輝 和 秘 一九〇〇年 映, 利 密藏經室 印 用 製已 從而 會的 和 闐 給敦煌吐 經大體完 孕育並推 敦煌文書 、尼雅、 已久的學 古代社會 政治、經 于闐文書 中發現了 敦煌文獻 連産生了 白年,爲 **血**,從藏

敦煌文獻的發現早已載入文化史册,這無疑是學術史上的盛事和幸事,它本該立即清洗被蒙 翳了近九

了 堡 程 館 百 布 這批 年的 在 法國 再則 中外公私收藏家手中者不知尚有幾許 H 歷 珍貴文獻的學術 本 國家圖 的 這批文化 史塵垢 大 谷光瑞考察團 書館 , 上 輝耀出它那炫目 的無價之寶一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 效應, , 這是曾使不 紛至 經 沓來 的學術光彩。 面世 , 少正 , 各 再加上有意無意的 便被 有 直 裹攜 熱心 然而 割裂分 0 的 而 , 敦煌學家扼 刧 散 則文化史上的 餘之物 0 英國 和北 人爲障礙 的 腕 京圖 斯坦 復遭散 痛惜 書館爲著名的 , 大 任何 從而造成研究工作 的 佚 法 新發現都 以 國的伯 至 目 四大庋藏家之外,散 有一 前 希 除 和 個 英國 的 俄 被 國家圖書 國的奥登 認識的過 影響

堡 研究 黎, 現 研 的 九三〇 如 番學家如季羨林 發展做 發展 究工 羅 拍 振 H 碩果爲 因 照片 年 本 作 玉 現了 而 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的 國際性 0 敦煌學的 內藤湖南 敦煌學增添了 嗣後 王國維、 敦煌學儘管目前已成爲一 他們辨識著録 抄遺書 的 學術研討會已經數度舉辦 唐長孺 我國學者董康、 初步繁榮景象 蔣伯斧、 • 那波利貞等等 編目録 光彩 ١ 撰寫序 饒宗頤等等正同一 劉師培 寫序 與中 而英國 跋 劉復、 門國際性的顯學, 跋, 或 , 也對敦煌文獻的 繆荃孫等人依靠伯希和等所提供的 的 的 産 斯坦 爲敦煌學的發展作出 生了 敦煌學家共同 胡適 大 中國敦煌 大批中青年學者進行着深入踏實 、王重民、 大批學術成果。 法國的 推 整理 吐魯番學會已經建立數年, 可它的誕生和發展卻是曲 動 沙 向達、姜亮夫等先後遠涉重洋 畹 7 研究作出了各自的 敦煌學的前 了卓越的貢獻 而敦煌學的正 伯希 和 進。 德國 有限照片和 到 陳垣 式命名則遲至三十 的 的 目 貢獻 格倫 折 研 前 而 究 此 原 緩慢 陳寅恪等更以他們的 威德爾 , 有影響的 件 爲敦煌學的開創和 敦煌學更有了蓬勃 學術 的 奔赴倫敦、巴 開始了艱難的 俄國的奧登 成 果 期的學者 敦煌吐魯 年後的一 不斷湧

節 些都是 煌 著述往 的 示了 石室真 角 這種景象的確是令人鼓舞的 對敦 文獻 研 往 度考慮, 跡 究後, 同輯印 的 録 煌文獻 刊 方才産生了王 敦煌文獻 布滋助了 文獻合二 整理 敦煌石室遺書》 的 研 而 的 成果 究的 輯 集、 或 , 進步 維 同時 諸如羅振 它的· 印 製同 陳寅恪等的學術著作 也是對敦煌文獻認識 • 出 研究的進步帶動了 鳴沙石室佚書 玉 敦煌 現自是中外數代敦煌吐魯番學家心 蔣伯斧、王仁俊等的 學的 整 理 \forall 研 文獻的 從 研 究 鳴沙石室古籍叢殘》 則是緊相連接又互 而奠定了敦煌學的 究 的 刊 布 成 《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 果 不僅 進一 Ĺ 如此 步 凝聚的 基 爲 , 礎 等都是交互出 促 在 敦煌文獻的 成果 對這些資料 進 此 的 後的 如 初 刊 發展在在都 期 果 進行縝密 A)、《敦的敦煌學 從工作環 布 現的,這 、《敦 同敦煌

此 值 成了 出 研 上 白 求其次 的學者都能閱讀原始文獻。 然已從無到有 被視 以其寶貴 推 來看 現 , 究的發展還存在着同步前進的現象。 , 讓敦煌學家身處書室, 作爲前提條件和對象目 爲是對學術研究的嚴重限制 嚴 進了敦煌學的 重 都帶有孤本的性 而 的 商得各收藏家(單位或個 已 分散 有限的學術時 被 開 從小到大, 發 0 一發展 況 利 A. 用 質; 的 這就是我們輯集出 間, 各藏家的管理 即能縱覽敦煌吐魯番文獻全貌 標的 加 不過這在目前的客觀 有了長足的 無論是宏觀 悉心於閱讀 以 出現之後, 0 自然還是提供研究的資料。而這 正是由於存在這種限制 人 觀念 發展 敦煌所發現的 的贊同 的整體研 分析 版《 和 即被分藏於世界各地 出 制 物質 現了 敦煌 協助 度又極 究還是微觀的具體研究 推 文獻 論 和 吐魯番文獻集成 初步的繁榮; 採 主 不 判斷 取現代影印方法 觀認識條件下 相 , 所以 既省卻奔波旅行之苦, 同 不論屬傳世文獻的 從而得出 從而造成了 , 然 在近 甚至同一 , 最理想的辦法是創 而 的 目 個世紀的漫長歲 科學的結論 大概都還無法實現 如果從敦煌文獻 都還是有待進 ,閱讀 的 輯集彙刊 件文獻 補充 又免除四 使 用 還是遺佚 復遭割 這結果就 使孤 造條 的 月 不便 所 步推 方求 本文 件使 提供 中 裂 文 閱之煩, 獻化身千 是,退而 動的。 敦煌學雖 獻 是從根本 的應有價 這不能不 破損 有志於此 的重新 爲 造

大小 意見 敦煌 均屬 過深 術界提供 物通過 成文獻;二、 項核心要求;三、定名準確。 説 人的 我們輯集彙印 長短 置 明 盡其所 吐魯番等地區 像反 考訂 性 份 質 、映出 能 形狀 力求存真。 全面可信的原始資料 地給文獻準確定名 意在 我們將汲 來, 的 方 色彩、 出 ^ 是會受到若干限 便使 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 現的各種文字資料和藝術資料 敦煌吐魯番文獻具有文獻和 取這份 字跡 用 給敦煌 可 圖版部分則 殘損. 貴的 四 因 吐 成果 制 自不 而 魯番文獻定名本身就是一項研究工作, 編排合理 而 有所 按序 必説 文字部分如前言 作爲我們編輯工 的 失的 排 預期 卽 列 使是紙質 文物兩重價值 目標是: , 集成 但失而 重在 盡 可能完整地反映出 實 是一套大型的資料性 作上 - 用 編例 不損其真 卷軸 兼及欣賞 的 相對完備 這就要求對文獻的 依據或參考 叙録 包封等等也 圖版力求其像 來, 0 分類目録、 做到 我們 數代學者已經在 使其成爲 置 圖 並 不宜 將 書 進 盡 文結合, 忽略 力搜 印製必須 年表、索 步聽 中 則是我 部總 心 求 E 取 發揮資料 引等等, 學術界的 然, 的在給學 這方面做 **通真**,其 進式的集 輯 們工作的 集 將實 , 將

集成 雖爲 我們所籌畫 推動和 實行 可實在 也是中外熱心於敦煌學的有識之士合作贊助 的成果, 的

最佳效果

别期望着他們能夠根據各自的需要提出改進的建議,在這裏,我們則要先此致謝了 教授、香港中文大學饒宗頤教授,他們於百忙中出任《集成》的學術顧問,使《集成》的編輯得 的學術保證,在此我們特申謝忱。 到了中外敦煌學家的熱情幫助,他們曾給予我們多方面的支持,特别是北京大學季羨林教授、臺灣潘重規 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法國國家圖書館等等,對此我們表示衷心的感謝。在籌畫、 像已列入第一批出書的上海博物館、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天津藝術博物館、俄羅斯科 我們還認爲,任何圖書的最具權威的評論家是該圖書的使用者 編輯過程中, 我們還得 到了可靠 學院東方 我們特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二日

Preface to The Corpus of Dunhuang-Turfan Manuscript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poor and weak China, where big powers predominated, saw two of the four major discoveries in her cultural history. One is the discovery of over 100,000 Yin ruins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in 1899 at Xiaotun village in Anyang of Henan Province, which has proved that China's recorded history existed several hundred years earlier than it used to be believed to, and provided reliable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Shang Dynasty. The other is the discovery of Dunhuang documents in 1900. Tens of thousands of manuscripts, printed texts, paintings and sculptures were discovered at the walled-up library of Cave No.17 in the Mingshashan Mogao Caves in Dunhuang County of Gansu Province. Although their value in academic research has not yet been fully recognized or utilized, these originals, including the colourful paintings, sculptures, and a large number of the manuscripts and printed texts dating from the period between the middle of the 4th century and the early years of the 11th century written in Chinese, Sanskrit, Tibetan, Sogdian, Uygur and Khotanese, cover a wide range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life of various nationalities in ancient Central Asia and West China and constitute a powerful source for the study of politics, economics, law, religion, language, literature, technology, art and customs in ancient China and Central Asia. Thus, the age-old gaps in a number of areas of learning have been finally filled. What is equally encouraging is the fact that many ancient manuscripts were also excavated in such places as Kucha, Khotan, Niya, and Loulan in Xinjiang's Turfan and Tarim Basin areas around the time of the discovery of the Dunhuang Library Cave. They are similar to Dunhuang texts in dates, content and forms and their excavation areas are close to Dunhuang. These documents, called Turfan documents or the Western Regions documents by experts, are interrelated with the Dunhuang texts, each providing reference and adding lustre to the other. Hence an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 ——Dunhuang-Turfan Studies—— came into being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ield of study. Now, compilation and printing of the Yin ruins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has almost been completed, thus facilitating further studies; however, the work of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Dunhuang-Turfan documents is far from being finished, which naturally causes great difficulty to the advancement of Dunhuang Studies.

The discovery of the Dunhuang texts has long gone down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which fact is undoubtedly a remarkable event in academia. Immediately after their discovery, the Dunhuang texts should have been cleaned of the dust of history gathered over nearly 900 years and given back their dazzling splendour in areas of learning. Yet throughout cultural history, all new discoveries have to undergo the process of winning recognition. Moreover, soon after these invaluable documents became available, they were taken away and scattered all over the world. "Inspection delegations" headed by Marc Aurel Stein of Britain, Paul Pelliot of France, S. F. Oldenburg of Russia and Otani Kozui of Japan came one after another and carried off large numbers of documents. What documents were left after the plunder were also scattered later on so that no one knows how many documents public or private collectors at home and abroad possess aside from those in the hands of the four main collectors: the British Library,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in France, St. Petersburg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Russia and the Beijing Library. In addition, there have been obstacles placed deliberately or inadvertently. All this has had an adverse effect on research in the rare documents and stabbed those upright and ardent Dunhuang scholars to the heart.

Now Dunhuang Studies has become a field of study of worldwide importance, but its birth and growth have undergone a slow and tortuous process. Earlier scholars like Luo Zhenyu, Wang Guowei, Jiang Bofu, Liu Shipei and Miao Quansun, making use of a limited number of photographs and originals provided by P. Pelliot and others, embarked on the

arduous work, distinguishing, editing, cataloguing, and prefacing. Their efforts yielded notable results. However, Dunhuang Studies was so named as late as 1930, thirty years after the Dunhuang documents were discovered. Later, Chinese scholars such as Dong Kang, Liu Fu, Hu shi, Wang Chongmin, Xiang Da and Jiang Liangfu went off one after another to London and Paris to take photographs of collections, copy ancient manscripts, catalogue and preface, making valuable contributions to the advancement of Dunhuang Studies. And the great achievements made in this field by Chen Yuan, Chen Yinque and others added glory to Dunhuang Studies. Mention should also be made of M. A. Stein, E. E. Chavannes, P. Pelliot, A. Grünwedel. S. F. Oldenburg, Naito Koman, and Naba Tosisada, who made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sifting and research of the manuscripts and did a lot for the birth and growth of Dunhuang Studies. Together with Chinese Dunhuang scholars, they pushed Dunhuang Studies forward. Hitherto, Dunhuang Studies has made remarkable progress and international seminars have been held for several times. It has been a few years since the Dunhuang-Turfan Academic Society of China was established and Dunhuang-Turfan scholars of high prestige such as Ji Xianlin, Tang Changru, and Rao Zongyi, as well as a large number of young and middle-aged scholars, have been doing steady and thoroughgoing research with notable results so that Dunhuang Studies has presented a picture of initial prosperity.

This encouraging picture is creditable to the joint painstaking efforts of generations of Dunhuang-Turfan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work of editing and printing Dunhuang documents and the sifting and research of Dunhuang Studies are closely interrelated and help each other forward. Earlier Dunhuang scholars often combined the two into one. Illustrative of the point are works like A Catalogue of Manuscripts in Dunhuang Caves and Their Discovery, Originals of Manuscripts in Dunhuang Caves, Ancient Manuscripts in Dunhuang Caves, Manuscripts in Mingsha Caves Lost and Found, and Serializing Fragments of classical Writings Found in Mingsha Caves written by Luo Zhenyu, Jiang Bofu, Wang Renjun and others. Such works are both fruit of sorting out Dunhuang documents and achievements in the study of the documents. After careful studies of such materials, academic works by Wang Guowei and Chen Yinque appeared, thereby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Dunhuang Studies. Its advancement indicates that publication of the documents has promoted progress in document study and progress, which has in turn given impetus to

publication of Dunhuang documents. Moreover, publication of the Dunhuang documents and advancement of Dunhuang Studies sometimes synchronized. The manuscripts discovered in Dunhuang are the only copies extant, no matter whether they are additions to texts hand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s or lost texts that have reappeared. In fact, these documents were carried off 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 soon after they were discovered. In some cases, sections of the same document came into the possession of different people. Besides, collectors differ widely in their concepts of management and system, which causes great inconvenience in reading and in making use of the materials and, to a great extent, hinders researches. Owing to these obstacles, either general research in the whole or specific study of details has yet to be improved although Dunhuang Studies has been built up from nothing and has taken on initial prosperity over a long period of nearly one century.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the prerequisite to the improvement of Dunhuang Studies is to provide research materials, and the ideal way would be to make the originals accessible to all ardent scholars. For various reasons, however, this goal may be difficult to achieve at present. After consultations with collectors, an agreement was reached, which was to photolithograph the entire corpus of the documents in one edition with the help of sophisticated equipment. In this way the only copies extant will be made available to all Dunhuang scholars, who could thus save the trouble of hunting for originals and devote their limited amount of valuable time to reading, analyzing, making inferences from and forming judgements of the photographic reproductions so that they might draw their own scientific conclusions. The work will give infinite impetus to the evolution of Dunhuang Studies. And this is our very aim in publishing The Corpus of Dunhuang-Turfan Manuscripts.

Our objectives in publishing *The Corpus of Dunhuang-Turfan Manuscripts* are as follows: (1) Relative completeness. We have tried to search, edit, and organize various manuscripts and paintings in Dunhuang-Turfan areas in an effort to publish a comprehensive corpus. (2) True to originals. Dunhuang-Turfan manuscripts have the dual values of documents and historical relics, which requires that the prints should be the very images of the originals, including their sizes, lengths, forms, colours, and traces of damaged calligraphy. We even took the quality of paper, scrolls, and covers into account. Naturally, it is difficult to present three dimensional objects in the form of two dimensions, but we

have tried our best to retain the images of the originals in the plates despite some insurmountable difficulties. In effect, we have striven for perfection in our work. (3) Accuracy in assigning titles. In fact, assigning titles to Dunhuang-Turfan documents is a kind of research in itself. In assigning titles to the documents, we will draw on available research achievements made by generations of scholars and consult contemporary scholars so as to reinforce accuracy. (4) Rational arrangement. This is a large-format comprehensive corpus suitable for reference. Our main purpose has been to make these documents available to the academic circles in an accurate and credible form. For the convenience of those interested in the corpus, the script section includes such expository items as editorial notes, table of contents, descriptive catalogue, and index. The plate section is arranged in order, with emphasis on practical value of the documents and due consideration to appreciation. Illustrations and expositions can both be found in the book. All this has been done with a view to making the most of this reference book.

Although we plan, edit, and publish this corpus, it is, so to speak, the fruit of the substantial support and joint efforts by ardent Dunhuang scholars of insight and relevant bodies at home and abroad. Acknowledgements must be made to Shanghai Museum, Shanghai Library, Beijing University Library, Tianjing Art Museum, the St. Petersburg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of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of Russia, and the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in France which are among the first to publish books on Dunhuang Studies. We also wish to express our thanks to many Chinese and foreign Dunhuang scholars who have given us their enthusiastic support. Our indebtedness is due particularly to the academic advisers to the corpus, Professor Ji Xianlin of Beijing University, Professor Pan Chonggui from Taiwan, and Professor Rao Zongyi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e think that readers of this corpus are the most authoritative cirtics, so their advice and suggestions will be greatly appreciated.

Wei Tongxian
July 12, 1992

transtlated by Wang Deming

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總目録

敦煌吐魯番文獻集成策畫弁言

魏同賢

編 例

附

録

叙録

年表

分類目録

索引

陳秉仁

序

言

上海圖書館藏敦煌吐魯番文獻

附傳世唐宋文獻